

农户收入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①

——基于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数据的实证分析

程名望¹ 史清华² [美] Jin Yanhong³

(1. 同济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
3.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al, Food and Resource Economics, Rutgers,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Jersey)

【摘要】本文采用2003~2010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调查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户收入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均滞后于城镇居民,其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性收入,而资产性收入的比例较低。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既有产业差异、区域分割、制度与政策等宏观因素,也有农户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投入、金融资产与社会资本拥有、农户家庭特征等微观因素。金融资产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全面性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社会资本及制度与政策等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

关键词 农户 收入水平 收入结构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中图分类号 F304.8 **文献标识码** A **JEL分类号** J2

Incomes Level, Structure and Its Causes

Abstract: Using National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 Data in China, this study investigates the farmers household incomes and its causes. We find that incomes and its growth of farmers in China are lagging behind that of the urban residents. The main source of farmer household incomes are labor incomes, while property incomes ratio are still very low. And the paper argues that the causes of the incomes are the integration of macroscopic factors such as industrial difference, region segmentation and national policies, and microcosmic factors such as 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ccording to the structural decomposition of incomes, the impact of some factors on the household income is comprehensive, and the impact of the other factors, such as human capital, physical capital, social capital and national policies, is structural.

Key words: Farmer Household; Incomes Level; Incomes Structure; National Rural Fixed Observation Point

^① 本文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073102、71173156、71273171、71373179)、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10YJC790032)的资助。特别感谢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办公室。

引言

1978年以来,始于农村的改革给农村经济乃至整个中国经济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农户收入水平持续稳定增长,如图1所示,和城镇居民相比,农户收入增速滞缓,工农差距、城乡差距总体呈现持续扩大趋势,“三农”问题依旧严峻和突出。2004~2013年,中央政府连续出台10个针对“三农”问题的“一号文件”,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诸如农业税减免、种粮直接补贴、良种补贴、大型农业机械补贴、家电补贴、基础教育“两免一补”、新农村建设等惠农支农政策,开启了新一轮的农村改革。这些政策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发展方针,对农民增收给予了充分的关注。进一步分析图1可见,2004年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出台和实施之后,农户收入水平增速有所提高,城镇农村收入比持续扩大的趋势有所收敛。但在此期间,农户收入增速仍滞后于城镇居民,城镇农村收入比依旧保持在3倍之上,表明我国工农差距、城乡差距依旧巨大,“农民增收难”这一难题依旧严峻。因此,工农差距和城乡差距的根本解决,“农民增收难”问题的有效克服,需要进一步找出其原因和影响因素,以制定更具针对性的政策和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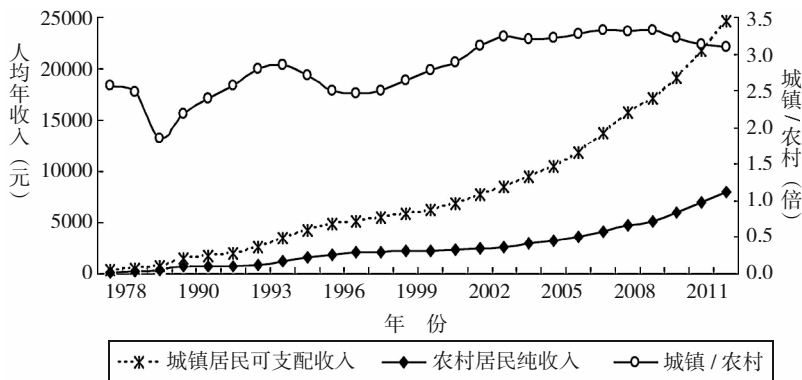


图1 城乡居民收入增长及其差距演变趋势 (1978~2012年)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国内外学者持续关注该问题,众多学者认识到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事实(Yang, 1999; Gibson等, 2001; 蔡昉, 2003; 陆铭和陈钊, 2004; 王小鲁和樊纲, 2005; 李实和罗楚亮, 2011; 王亚峰, 2012)。另外一些学者则从农户收入水平低或增长滞缓的视角,研究了我国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Morduch和Sicular, 2000; Walder, 2002; Gustafsson和Li, 2002; 万广华, 2004; 许庆等, 2008; 王睿和黄森, 2010; 罗楚亮, 2012)。其中,李实(2003)进行了良好的总结,认为影响我国农户收入水平的因素主要有4个:一是农户在非农产业与农业之间的劳动力配置差异;二是地区分割引起的地区收入差异;三是农村财产分配的影响;四是税费制度的累计效应。李实(2003)的总结主要是考虑了宏观因素,而实际上,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微观因素众多而重要。国外学者十分重视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社会资本等微观基础对收入水平的重要影响(Kuznets, 1955; Blinder, 1973; Oaxaca和Ransom, 1994; Park, 1996; Lucas, 1998; Autor等, 2003; Zhang等, 2012)。例如,Miner(1974)的研究发现,美国1959年收入水平的33%可由教育和工作经历给予解释;Psacharopoulos(1985)对60多个国家教育收益率的估算也表明,发展中

国家的教育收益率都在 15% 以上。Morduch 和 Sicular (2000)、Walder (2002)、Knight 和 Yueh (2008)、Zhang 等 (2012) 认识到政治身份等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重要作用, 研究认为具有政治身份的农户的经济收入显著高于普通农户。近年来, 国内学者也开始重视该问题, 例如, 邹薇和张芬 (2006)、杨新铭和罗润东 (2008)、高梦滔和姚洋 (2006)、王海港等 (2009)、徐舒 (2010) 的研究均认为基础教育、职业培训等人力资本投入对中国农户收入水平有显著影响。王弟海 (2012) 认识到营养和健康对人力资本的重要性, 并认为健康人力资本 (Health Human Capital) 可避免农户陷入“贫困陷阱” (Poverty Trap)。张爽等 (2007) 认识到政治身份等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的重要作用, 研究认为丰厚的社会资本提高了农户收入。徐月宾等 (2007)、章元等 (2009) 从农户家庭特征视角进行的研究发现, 较高的人口负担率、对农业的高度依附不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通过与以上已有文献的比较, 本文的创新和贡献主要有三点: 第一, 已有研究多采用基于《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农村统计年鉴》等统计年鉴公布的宏观经济数据, 基于田野调查的个人或农户家庭的微观数据的文献较稀少, 而涵盖中国大部分省份个人或农户微观数据的研究更是十分鲜见。本文采用 2003~2010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调查数据, 该数据涵盖全国 31 个省份, 共计家庭数据 163305 份, 家庭成员数据 644167 份, 是极其珍贵的, 具有极强代表性的大样本微观数据。第二, 由于数据缺乏或者模型建立的局限, 已有研究要么仅仅考虑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国家政策 (例如户籍政策、税收政策) 等宏观因素, 要么仅仅考虑教育水平、职业培训等微观因素, 在模型建立中忽视了重要的影响因素或控制变量, 既可能导致模型的解释力不足, 也可能导致研究结果存在偏差甚至错误。本文基于扩展的农户收入决定函数, 在尽力控制农户异质性后, 更全面地考虑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宏观因素和微观因素, 特别是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 增加了部分随着社会变化而逐渐呈现影响的因素, 例如金融资产、社会资本、惠农政策等, 使得分析结果更加精确和全面。第三, 已有研究侧重于研究农户总体收入水平及其影响因素, 对农户收入结构性及其影响因素的探析较少。本文从农户收入来源与结构分解的视角, 探析诸因素对农户收入水平的结构性影响及其作用路径。

一、数据来源与统计性描述

1. 数据来源

农村固定观察点是 1984 年经中央书记处批准建立, 由中央政策研究室和农业部具体组织指导, 在全国各省份连续跟踪的一项农村调查工作。农村固定观察点数据有两个鲜明的特征和优势: 一是调查范围广、样本量大。该调查覆盖了全国 31 个省份, 每年调查 2 万户左右。二是内容丰富。从 2003 年起, 该调查使用了农村住户 (农户) 和家庭成员两级问卷。调查问卷由“家庭成员构成情况”“土地情况”“固定资产情况”“农户家庭生产经营情况”“出售农产品情况”“购买种植业生产资料情况”“家庭全年收支情况”“全年主要食物消费量”“主要耐用物品年末拥有量及居住情况”9 部分构成, 较为全面地反映了我国各地区农户及其家庭成员的生产、消费、就业、生活及其他各项活动。该特征和优势为本文在计量模型中较全面地选择变量提供了可能及良好的数据基础。2003~2010 年, 合计分别获得住户、家庭成员数据 163305 和 644167 份 (具体的样本数及分布见表 1)。本文数据的基本处理方式是, 首先处理家庭成员数据, 计算并生成实证分析中需要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健康状况均值等诸多家庭劳动力 (成员) 信息或变量; 然后以户主为标识码 (ID), 把家庭成员数据与住户数据对接, 并把数据处理干净 (主要是对缺失值和异常值的处理), 共得到本文实证分

析所应用的核心数据 161912 份, 该数据为有“洞”(Gap)的非平衡面板数据(Unbalanced Panel Data)。

表 1

样本数及分布

单位: 份

类型	2003 年	2004 年	2005 年	2006 年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合 计
农村住户	20334	19613	21042	20769	19834	20561	20714	20438	163305
家庭成员	82356	88245	84171	83092	79065	65535 ^①	81642	80061	644167

资料来源: 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 (2003~2010 年)。

2. 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长

按照不变价格^②计算的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及增长趋势如图 2 所示。首先, 就收入水平看, 东部和东北较高, 中部和西部偏低。以均值为例, 2003~2010 年, 农户人均年收入为 7302.29 元。其中, 东部最高, 为 9821.12 元; 东北次之, 为 7644.94 元; 中部再次之, 为 5819.73 元; 西部最低, 为 5512.53 元。和东部相比, 东北、中部和西部分别低 28.47%、40.74% 和 43.87%。其次, 就增速看, 农户人均年收入由 2003 年的 5744.63 元到 2010 年的 7302.29 元, 年均增速为 7.90%。这表明, 随着中国整体经济和农村经济持续发展, 特别是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及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的出台和实施, 农户人均收入水平呈现稳步提升的良好趋势。但在此期间, 农户人均收入增速仍滞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 (9.41%) 和全国经济增长率 (11.11%)^③, 表明我国农户收入增速滞缓依旧是值得研究和重视的重要课题。进一步分析区域差异发现, 中部和东北的农户人均收入增速较高 (分别为 10.60% 和 8.26%), 其次是西部 (7.37%), 最低是东部 (7.13%)。由此可见, 我国农户收入增长的区域分布呈现典型的“纺锤型”状态, 即经济最发达的东部和最不发达的西部地区, 农户收入增速较慢, 而经济发展居中的中部和东北区域, 农户收入水平增长较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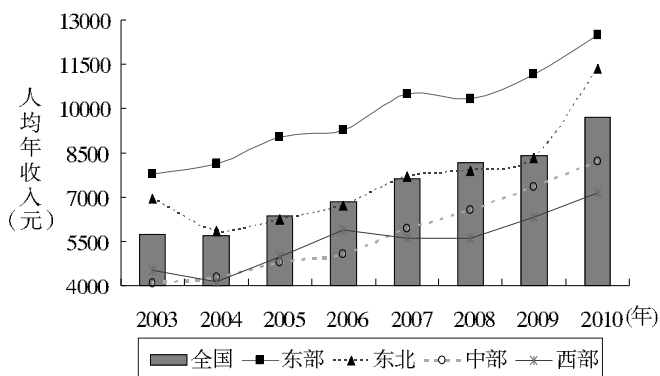


图 2 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长趋势 (2003~2010 年)

3. 农户收入来源及结构

就农户收入来源与结构看 (见图 3), 2003~2010 年, 农户最主要的收入来源是“家庭经

① 2008 年家庭成员数据中, 部分西部省份数据缺失。

② 以 2003 年为基年, 采用历年各省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进行调整, 数据来自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下文中涉及的所有收入和资产变量, 均按照同样的方法进行调整。

③ 按不变价格计算得到,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2013)》。

营收入”和“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①，其占农户家庭总收入的比例分别为 57.78% 和 24.90%，合计占比达 82.68%。然后是转移性支付和财产性收入，占比分别为 8.67% 和 6.32%，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占比最低，为 2.32%。由此可见，首先，由“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和“非农业家庭经营收入”组成的家庭经营收入依旧是我国农户的核心收入来源^②，基于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依旧是中国农村经济的鲜明特征。其次，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外出务工或经商收入已经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最后，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以“家庭经营收入”和“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为核心的劳动性收入，财产性收入的比例较低，转移性支付的比例也有待提高。进一步就演变趋势看，2003~2010 年，和其他收入来源相比，最明显的趋势是，资产性收入和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增速最快（年均增速分别为 19.89% 和 16.06%），占家庭总收入的比例稳步提高；然后是转移性支付收入，年均增速为 7.21%；而家庭经营收入和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的增速最慢，年均增速分别为 4.46% 和 3.46%。由此可见，农户收入结构正发生一定的变化，在传统的家庭经营收入保持基本稳定的情况下，外出务工或经商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户收入新的增长点；而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高度重视及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转移性支付收入也呈现快速增长的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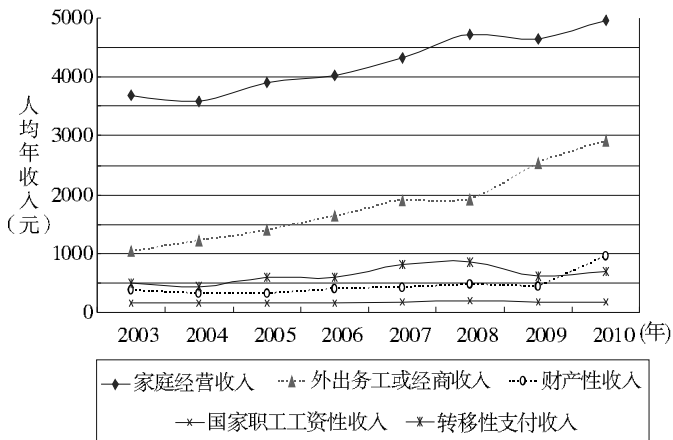


图 3 农户收入结构及演变趋势

二、模型建立与实证分析

1. 模型建立与变量设置

收入变量一般是符合正态分布的(Shorrocks 和 Wan, 2005),对本文数据中收入变量的正态性检验也证实了这一点(Swilk 检验中,Z 值为 29.39,具有良好的显著性)。因此,本文选择半对数模型,根据农户收入决定函数(Morduch 和 Sicular, 2000),扩展并建立计量方程如下:

$$\ln Y_{it} = \beta_0 + \sum_{k=1}^K \beta_k HC_{itk} + \sum_{l=1}^L \beta_l PC_{itl} + \sum_{m=1}^M \beta_m FA_{itm} + \sum_{n=1}^N \beta_n SC_{itn} + \sum_{o=1}^O \beta_o ES_{it o} + \sum_{p=1}^P \beta_p SP_{it p} + \sum_{q=1}^Q \beta_q EP_{it q} + \sum_{r=1}^R \beta_r FC_{itr} + \sum_{s=1}^S \beta_s CV_{its} + \epsilon_{it} \quad (1)$$

① 由于调查问卷在 2004 年做了适度调整,把 2003 年调查问卷中的“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拆分成“外出打工收入”和“外出经商收入”2 项。为了保持数据的一致性,处理 2004~2010 年数据时,把外出打工收入和外出经商收入相加,定义为“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

② 进一步,就家庭经营收入的构成看,“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和“非农业家庭经营收入”占比分别为 58.73% 和 41.27%。则表明农业经营在农户家庭经营中依旧占据首要地位。

在该模型中,被解释变量 $\ln Y_i$ 表示农户人均收入的对数,其中 i 表示第 i 个农户, t 表示年份。解释变量 HC、PC、FA、SC、ES、SP、EP、FC、CV 分别表示人力资本^①、物质资本^②、金融资产、社会资本^③、就业行为、制度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家庭特征和控制变量; ϵ_{it} 是随机扰动项。每一组解释变量,都设置了系列细化变量或替代变量,具体的变量设置、定义及统计性描述见表 2。

需要说明的是,农户收入主要取决于家庭劳动力而不是全部家庭成员。因此,大部分解释变量采用了家庭劳动力数据,而不是家庭成员数据。但个别变量根据实际情况采用了家庭成员数据,例如:“人均耕地面积”“非农户口家庭成员比例”等采用家庭成员数据,是因为在家庭承包责任制下,以土地为核心的生产资料是以户籍为标准,按家庭成员总数而不是按家庭劳动力进行分配。表 2 较详细的区分和描述了该问题。

表 2 变量设置及统计性描述分析

变量设置及度量方法			统计性描述		
类 型	变量名	定 义	替代变量或度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人力资本 (HC)	health	健康	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均值 ^④	4.50	0.57
	education	教育	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年)	7.23	1.70
	experience	工作经验	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年) ^⑤	22.21	7.29
	experience ²	专业技能	家庭劳动力平均工作年限平方	546.22	370.56
	technology	非农职业培训	有专业技术职称家庭劳动力比例(%)	5.81	15.94
	training	农业技术教育	受过非农职业教育或培训家庭劳动力比例(%)	8.13	18.85
	atraining		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家庭劳动力比例(%)	6.68	20.28
物质资本 (PC)	farmland	耕地	家庭人均耕地面积(亩)	2.02	4.72
	pcapital	生产性资本	年末人均拥有生产性固定资产原值(元)	1855.17	10904.77
	housedur	房屋耐用品资产	年末人均房屋、耐用品资产原值(元)	36304.12	84522.63

① 人力资本变量的选择,按照 Schultz (1961)、Becker (1966) 的研究框架界定。Schultz (1961)、Becker (1966) 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存在于人体之中的具有经济价值的知识、技能和体力等因素之和,其核心影响因素是教育水平和健康状况。

② 物质资本也被有些学者称为经济资本或实物资本。本文物质资本细分变量的选择,依据高梦滔和姚洋 (2006) 的界定。

③ 从其基本内涵看,社会资本是相对于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概念,指社会主体间紧密联系的状态及其特征,其表现形式有社会网络、规范、信任、权威、宗教、行动的共识以及社会道德等方面 (Lin, 2001)。本文社会资本变量的选择,依据 Lin (2001) 的界定。

④ 对于健康状况评价,调查问卷依次给出“优”“良”“中”“差”和“丧失劳动能力”5个选择项,运用李克特 (Likert) 五点量表尺度进行测量,分别赋值为“5”“4”“3”“2”“1”,代表健康状况逐渐有序下降。

⑤ Mincer (1974) 在其经典的收入决定方程中,加入了工作经验这一变量并论证了其对收入的重要作用。后续相关研究多依据该收入决定方程,考虑工作经验这一重要变量。本文采用张泓骏和施晓霞 (2006) 的做法,由家庭劳动力平均年龄减去 18 (18 岁为法定劳动力的年龄下限) 得到工作经验的数据。本数据的假设是充分就业,即只要到了劳动年龄即开始就业积累工作经验。而实际上,存在部分适龄劳动力未就业或充分就业的现象,所以严格来讲,该数据是“工作经验”的替代变量。

(续)

变量设置及度量方法			统计性描述		
类 型	变量名	定 义	替代变量或度量方法	均值	标准差
金融资产 (FA)	inasset	金融资产	家庭人均年末金融资产金额 ^① (元)	18203.43	68782.30
	loan	金融负债	家庭人均年内累计借贷金额 (元)	2029.80	18232.28
社会资本 (SC)	ccadre	国家干部户	是=1, 否=0	0.05	0.21
	vcadre	乡村干部户	是=1, 否=0	0.04	0.21
	party	党员户	是=1, 否=0	0.15	0.36
	soldier	军烈属户	是=1, 否=0	0.02	0.14
	guarantee	五保户	是=1, 否=0	0.00	0.07
	minority	少数民族户	是=1, 否=0	0.12	0.32
	religion	信教户	是=1, 否=0	0.06	0.23
就业行为 (ES)	nonfarm	家庭经营主业	非农业=1, 农业=0 ^②	0.16	0.37
	naday	农村非农就业	劳动力人均本村非农业劳动时间 比例 (%)	19.73	30.29
	townday	外出从业	劳动力人均外出从业时间比例 (%)	36.03	35.95
制度与政策 (SP)	system	户籍制度	非农户口家庭成员比例 (%)	4.34	16.20
	policy	惠农政策	是否享有惠农政策 ^③ (是=1, 否=0)	0.80	0.40
区域经济 水平 (EP)	village	村经济发展水平	村人均收入 (元)	7149.33	4234.18
	province	省经济发展水平	省人均收入 (元)	7242.36	6576.55
家庭特征 (FC)	fimilytype	家庭类型	核心家庭 (cfamily) = 1 直系家庭 (lfamily) = 2 扩展家庭 (efamily) = 3 不完全家庭 (ifamily) = 4 ^④	1.41	0.75
	headgender	户主性别	男=1, 女=0	0.94	0.25
	size	家庭规模	家庭人口总数	3.96	1.56
	dependency	人口抚养比 ^⑤	(非劳动人口数÷劳动力数) × 100%	0.57	0.60
控制变量 (CV)	region	区域	东部=1, 东北=2, 中部=3, 西部=4	2.34	1.16
	year	年份	2003~2010 年	2006.52	2.29
总样本数 (obs)			161912		

① 根据调查问卷, 包括“年末存款余额”“年末手存现金”“年末借出款余额”和“年末家庭外投资余额”4项。

② 采用大农业概念 (即广义农业, 是指农、林、牧、副、渔在内的综合农业), 调查问卷中家庭经营为“种植业”“林业”“畜牧业”和“渔业”的定义为“农业家庭经营户”, 赋值为“0”; “工业”“建筑业”“商业”等其余5项定义为“非农业家庭经营户”, 赋值为“1”。

③ 包括“农业税减免”、“农业补贴政策” (包含问卷中的粮食直接补贴、良种补贴、生产资料综合补贴、农机购置补贴、家电下乡补贴、汽车下乡补贴等项) “新农保政策”等, 只要享有或参与其中一项, 即赋值为“1”, 否则赋值为“0”。

④ 核心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只存在一对姻缘关系, 也即由一对夫妇或一对夫妇与未婚子女组成的家庭; 直系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存在两对及以上姻缘关系, 且这些姻缘关系之间是异代之间的关系, 同代之间不存在妯娌或连襟关系, 也就是说在这类家庭中, 可以有二代、三代以至多代存在; 扩展家庭是指在一个家庭中存在两对及以上的姻缘关系, 且这些姻缘关系在同代间存在妯娌或连襟关系, 也即至少有两对姻缘关系之间不存在任何亲子关系; 不完全家庭是指不存在完整夫妻关系的家庭, 即夫妻双方离异或一方丧偶, 由单方与子女生活。根据古德的研究, 全世界的家庭类型正在朝着核心家庭的方向发展, 而这是和城市化、工业化以及全世界的社会现代化密切相关的 (程名望等, 2006)。

⑤ 人口抚养比又称人口抚养系数或劳动力负担系数, 是指人口中非劳动年龄人口数与劳动年龄人口数之比。

2. 回归结果及分析

由于本文的数据为面板数据,需要检验回归分析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Fixed Effects Model),还是随机效应模型(Random Effects Model)。Hausman Test的结果表明(见表3),应该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其次,由于样本数据之间可能存在一定的相关性和异方差,回归分析时采用了聚类分析^①(Cluster Analysis)和稳健性回归分析(Robust Regression Analysis)。最后,对于农户异质性问题的克服,由于本文所用数据时间跨度不大,因此使用了组内交换(Within)的方法^②。回归结果如表3中模型1所示。在模型1中,F值和Pseudo R²值分别为503.53和0.4745,表明所设立的模型形式是合适的,模型整体具有显著性及良好的解释力。具体分析如下:

(1)就人力资本看,选定的6个细分变量均显著,充分表明人力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家庭劳动力健康状况均值”每增加一个单位,农户人均收入增加3.81%;家庭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或工作经验每增加1年,农户人均收入分别增加1.06%和1.64%;家庭劳动力具有专业技术职称、受过非农职业教育或培训、受过农业技术教育或培训的比例每增加1%,农户人均收入分别增加9.85%、4.18%和2.88%。因此,重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特别是强化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技术培训,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将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2)就物质资本看,选定的3个细分变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物质资本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其中,人均耕地面积每增加1亩,农户人均收入提高2.09%;人均固定生产性投入或房屋耐用品资产每增加1%,农户人均收入分别提高3.09%和3.92%。由此可见,耕地面积、生产性资本投入或房屋耐用品资产的增加,均有利于增加农户收入。首先,中国农民对于耕地依旧具有较强的依赖性,保护耕地面积,死守“18亿亩红线”不动摇,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有利于维持农户的收入水平。其次,在农村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基本制度下,我国的农业耕地仍旧是小块耕作,土地细碎化明显,规模不经济现象较严重,阻碍了农业投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改革土地制度,推进家庭农场模式^③,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是提高农业效益、保持农业持续投入增加和农户收入提高的必由之路。最后,维护农户房屋耐用品资产的产权及价值增值,增加农户财产性收入,是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新增长点。

(3)就金融资产看,选定的2个细分变量均在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表明金融资产对农户收入水平有显著作用。其中,人均金融资产额或人均累计借贷额每增加1%,农户人均收入分别增加3.20%和0.61%。由此可见,完善农村金融市场,鼓励农户金融交易,激活农户金融资产,对提高农户收入有积极作用。

① 对户码(ID)进行了聚类分析。

② 对于时间跨度不大的面板数据,组内交换的方差分析方法比广义差分法更为有效(Hausman和William,1981)。

③ 2013年2月,中央一号文件《关于加快发展现代农业进一步增强农村发展活力的若干意见》首次提出“家庭农场”概念。家庭农场以采用大型农业机械、先进农业技术的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其实质是技术和资本投入替代劳动投入。

(4) 在选定的系列社会资本变量中, 政治资本^①的显著性十分明显, 表明政治资本给政治资本户带来了显著的经济收入。其中, 乡村干部户比非乡村干部户高 10.60%; 党员户比非党员户高 3.95%。对于政治资本获得经济收益的原因和途径, Morduch 和 Sicular (2000)、Zhang 等 (2012) 认为主要来自于干部工资; Walder (2002) 的研究则表明, 党员或干部会依靠其政治资本从迅猛兴起的私营企业、国有或集体企业私有化中谋得经济收益; Knight 和 Yueh (2008) 的研究发现, 党员、干部通过会议、文件等形式, 能更快更准确地获取有价值的政治、经济信息, 并相互提供帮助, 获得诸如就业选择、社会福利等收益, 最后转化为明显的经济收益。其次, 代表农村弱势群体的“是否军烈属户”和“是否五保户”两个变量均不显著, 表明我国政府实施的一系列对于农村弱势群体的扶助政策, 对于改善农村弱势群体的经济状况起到了积极作用。再次, 代表特殊群体的“是否少数民族户”和“是否信教户”2个变量, 前者不显著, 后者显著但为正。表明少数民族户和宗教信仰户的收入水平并没有显著低于普通农户。因此, 继续强化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区域扶持发展战略, 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 提高少数民族户和宗教信仰户的收入, 将有利于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稳定。

(5) 就就业行为看, 首先, 变量“家庭经营主业是否为非农业”的系数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非农业家庭经营户, 其人均收入比农业家庭经营户高 11.63%。其次, “人均本村非农业劳动时间比例”和“人均外出从业时间比例”的系数也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其比例每提高 1%, 农户人均收入分别增加 14.26%和 17.72%。由此可见, 就业和行业选择是影响农户收入的重要变量, 非农经营或非农部门就业均有利于增加农户收入。因此, 继续推进我国城镇化步伐, 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 无论是农村非农就业 (即“离土不离乡”), 还是外出务工 (即“离土又离乡”), 均对农户增收有积极作用。

(6) 就制度与政策看, 首先, 户籍制度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是显著的, 非农户口家庭成员比例每增加 1%, 农户人均收入增加 4.82%。其次, 惠农政策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也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系列惠农政策的实施, 使得农户人均收入提高了 3.59%。因此, 逐步取消户籍制度及其代表的制度红利, 逐步完善农村和城乡劳动力市场, 以消除农民就业的行业障碍和制度歧视; 继续强化和实施系列惠农支农政策, 将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7) 就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看, 村域经济对农户收入影响十分显著, 村人均收入每增加 1%, 农户人均收入增加 7.44%; 而省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并没有显著为正。因此,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是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因素之一, 而村域经济比省域经济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更直接、更显著。也就是说, 从发展平台的视角看, 农户收入更多地是依赖于本村经济发展水平, 而不是本省经济发展水平。因此, 以发展村域经济为突破口, 自下而上发展农村经济, 提高农户收入, 具有一定的政策意义^②。

(8) 就家庭特征看, 家庭类型和户主性别对农户收入均无显著影响, 而家庭规模和人口抚养比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家庭规模越大, 或者人口抚养比越高, 家庭人均收入越低。其中, 每增加一个家庭成员, 家庭人均收入降低 8.55%; 人口抚养比每增加 1%, 家庭人均收入降低 12.95%。因此, 坚持并适度调整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 既适合控制农户家庭规模, 又保证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 将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提升。

① 对于政治资本的界定, 一般文献中论及的政治资本即制度化的社会资本, 指的是由政党、政权及意识形态提供的身份、权力、资源和由此而来的威慑力和影响力 (Szelenyi, 1978; Lin, 2001)。在众多围绕市场转型理论进行争论的学者那里, 干部或党员身份经常被用作政治资本的表征, 用以定量研究政治资本对个体间收入差距的影响 (Morduch and Sicular, 2000)。

② 从该角度讲, 目前国家实施的“大学生村官”“村民选举”等基于村落的一系列制度, 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表 3

计量回归及稳健性检验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1 (fe)		模型 2 (fe)	
		系数	标准误 ^①	系数	标准误
常数项 (cons)		1.2316***	0.2007	2.0676***	0.1277
人力资本 (HC)	health	0.0381***	0.0055	0.0463***	0.0053
	education	0.0106***	0.0021	0.0098***	0.0017
	experience	0.0164***	0.0023	0.0162***	0.0020
	experience ²	-0.0003***	0.0000	-0.0003***	0.0000
	technology	0.0985***	0.0240	0.0943***	0.0206
	training	0.0418*	0.0213	0.0576***	0.0151
	atraining	0.0288**	0.0126	0.0117	0.0117
物质资本 (PC)	farmland	0.0209***	0.0026	0.0103***	0.0018
	Log (pcapital)	0.0309***	0.0021	0.0089***	0.0012
	Log (housedur)	0.0392***	0.0037	0.0065***	0.0012
金融资产 (FA)	Log (inasset)	0.0320***	0.0014	0.0232***	0.0008
	Log (loan)	0.0061***	0.0010	-0.0013	0.0009
社会资本 (SC)	ccadre	0.0212	0.0179	0.0631***	0.0157
	vcadre	0.1060***	0.0190	0.1221***	0.0137
	party	0.0395***	0.0139	0.0407***	0.0121
	soldier	0.0295	0.0209	0.0334*	0.0174
	guarantee	-0.0107	0.0465	-0.0027	0.0230
	minority	0.0202	0.0210	0.0388**	0.0175
	religion	0.0291*	0.0173	0.0291**	0.0146
就业行为 (ES)	nonfarm	0.1163***	0.0095	0.0875***	0.0078
	naday	0.1426***	0.0124	0.2164***	0.0105
	townday	0.1772***	0.0112	0.3777***	0.0095
制度与政策 (SP)	system	0.0482**	0.0200	0.0413**	0.0175
	policy	0.0359***	0.0088	0.0394***	0.0064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EP)	Log (village)	0.7440***	0.0129	-0.0085	0.0111
	Log (province)	-0.0059	0.0188	0.6510***	0.0118
家庭特征 (FC)	lfamily	-0.0070	0.0082	-0.0168**	0.0072
	efamily	0.0240	0.0214	0.0408**	0.0171
	ifamily	0.0081	0.0197	-0.0114	0.0190
	headgender	0.0225	0.0193	0.0054	0.0167
	size	-0.0855***	0.0036	-0.0914***	0.0030
	dependency	-0.1295***	0.0070	-0.1456***	0.0064
控制变量 (CV)	region	Yes		Yes	
	year	Yes		Yes	
R ²		0.4745		0.5411	
F 值		503.53		823.80	
hausman 检验 (χ^2 值)		785.71		1207.26	
样本数 (obs)		110280		109492	

注：所用软件为 Stata/SE 12.0；***、**、* 分别表示在 1%、5% 和 10% 水平上显著；“Yes”表示该变量已经被控制。

① 由于采用了稳健性回归分析 (Robust Regression Analysis)，该标准误为 Robust Standard Errors。

3. 稳健性检验

计量分析中（模型 1），被解释变量是基于农户总收入。而在已有研究中，一些学者常采用农户纯收入作为被解释变量，并认为纯收入能更好地反应农户的生存和生活状况（Gustafsson 和 Li，2002；章元等，2009；李实和罗楚亮，2011）。基于此，用“农户人均纯收入对数”替代上文模型 1 中的被解释变量“农户人均收入对数”，建立模型 2，以检验模型的稳健性，回归分析的结果见表 3。

比较模型 2 与模型 1 的回归结果可以发现，被解释变量替代为农户纯收入水平后，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社会资本、就业行为、制度与政策、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和家庭特征等主要变量的显著性与模型 1 基本一致，仅有“职业培训”、“惠农政策”等极个别细分变量的显著性有所差异，但这不影响前文的核心分析和基本结论。因此，模型 1 中的主要发现和结论总体上是稳健的。

进一步分析可发现，显著性发生变化的变量，其主要原因可能是家庭总支出的变化产生的影响。例如：“惠农政策”在模型 1 中显著，但在模型 2 中变得不显著，其可能的原因在于惠农政策在增加农户总收入的同时，也刺激了农户总支出的增加，特别是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和生活消费支出。统计性描述分析发现，和没有享有惠农政策的样本相比，享有惠农政策的样本，其家庭人均总支出高出 6.78%^①，其中，人均生产性固定资产支出和人均消费支出分别高出 12.85% 和 3.31%。限于篇幅，本文对该问题不再做进一步的分析与验证。

三、基于收入结构分解的进一步分析

上文分析了农户总体收入水平的影响因素，而基于农户结构性收入的进一步分析，有利于探究诸因素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机理和作用路径。本部分采用计量方程（1）的结构，分别对农户 5 种主要的收入来源（见图 3）建立计量模型。其中，模型 3~模型 7，被解释变量分别是“家庭经营收入”“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财产性收入”“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转移性支付收入”的对数（人均可比价格）。回归结果见表 4^②。分析表 4 可见，部分解释变量在 5 个模型中的系数及其显著性并不一致，表明同一因素，对不同的收入来源的影响存在显著差异，甚至在对某种收入有促进作用时，却可能对另外某种收入起到抑制作用。

表 4

结构性收入计量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模型 3 (fe)	模型 4 (fe)	模型 5 (fe)	模型 6 (fe)	模型 7 (fe)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常数项 (cons)		0.8620*** (0.4891)	-0.9926 (0.6288)	-5.3837*** (0.5374)	-0.6251** (0.3070)	-3.9651*** (0.4743)
人力 资本 (HC)	health	0.0561*** (0.0188)	0.0921*** (0.0299)	-0.0096 (0.0230)	-0.0334** (0.0137)	-0.0518** (0.0202)
	education	-0.0081 (0.0069)	0.0572*** (0.0100)	0.0120 (0.0077)	0.0362*** (0.0055)	-0.0196*** (0.0071)
	experience	0.0228*** (0.0074)	0.0383*** (0.0112)	0.0080 (0.0088)	0.0167*** (0.0055)	-0.0448*** (0.0076)

① 白重恩等（2012）研究了新农合这一惠农政策对农户消费的影响，得出该比例为 5.6%。也较好地印证了本文此处的猜想与假设。

② 采用了和模型 1 同样的计量方法，即回归分析时采用了豪斯曼检验、聚类分析、稳健性回归分析、组内交换等方法，相关结果见表 4，不赘述。

(续)

解释变量		模型 3 (fe)	模型 4 (fe)	模型 5 (fe)	模型 6 (fe)	模型 7 (fe)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人力资本 (HC)	experience ²	-0.0007*** (0.0002)	-0.0015*** (0.0002)	-0.0001 (0.0002)	-0.0002* (0.0001)	0.0011*** (0.0002)
	technology	-0.0387 (0.0938)	0.0170 (0.1270)	0.0194 (0.1034)	0.3294*** (0.0803)	-0.0114 (0.0817)
	training	0.0649 (0.0653)	0.1704* (0.0953)	0.1090 (0.0767)	0.0042 (0.0581)	0.1865*** (0.0659)
	atraining	0.0009 (0.0383)	-0.1287* (0.0699)	-0.1500*** (0.0550)	-0.0266 (0.0376)	-0.0461 (0.0485)
物质资本 (PC)	farmland	0.0830*** (0.0122)	-0.0205*** (0.0064)	-0.0635*** (0.0101)	0.0002 (0.0017)	0.0067** (0.0029)
	pcapital	0.2035*** (0.0067)	-0.0485*** (0.0069)	-0.0389*** (0.0057)	0.0004 (0.0031)	0.0176*** (0.0048)
	housedur	0.0250*** (0.00533)	0.0346*** (0.0067)	0.0090* (0.0055)	0.0029 (0.0034)	0.0272*** (0.0054)
金融资产 (FA)	inasset	0.0230*** (0.0026)	0.0343*** (0.0040)	0.0486*** (0.0033)	0.0038** (0.0019)	0.0150*** (0.0031)
	loan	0.0110*** (0.0029)	-0.0023 (0.0046)	0.0075** (0.0038)	-0.0017 (0.0022)	0.0438*** (0.0036)
社会资本 (SC)	ccadre	-0.1670*** (0.0605)	-0.4330*** (0.0909)	-0.0293 (0.0753)	1.6441*** (0.1125)	0.0169 (0.0651)
	vcadre	0.1210* (0.0642)	-0.4013*** (0.0876)	1.3508*** (0.0958)	0.6565*** (0.0765)	0.2916*** (0.0642)
	party	0.0244 (0.0483)	0.0891 (0.0681)	0.0589 (0.0608)	0.2505*** (0.0476)	-0.0101 (0.0499)
	soldier	-0.0163 (0.0609)	0.0612 (0.1002)	0.0067 (0.0917)	0.1734** (0.0769)	0.2105*** (0.0735)
	guarantee	0.0813 (0.1140)	-0.0026 (0.1725)	-0.0640 (0.1360)	-0.1553* (0.0926)	0.2731** (0.1244)
	minority	0.1658*** (0.0518)	0.0298 (0.0944)	-0.2069*** (0.0641)	0.0082 (0.0451)	-0.0342 (0.0656)
	religion	-0.1798*** (0.0569)	-0.0430 (0.0857)	-0.0261 (0.0672)	0.0421 (0.0373)	0.1743*** (0.0660)
就业行为 (ES)	nonfarm	0.3355*** (0.0494)	-0.6058*** (0.0512)	0.1204*** (0.0403)	0.0351 (0.0242)	-0.1277*** (0.0354)
	naday	-0.3530*** (0.0441)	1.0231*** (0.0656)	0.5329*** (0.0500)	-0.0207 (0.0303)	-0.1834*** (0.0396)
	townday	-1.6569*** (0.0451)	4.7162*** (0.0610)	0.3858*** (0.0425)	-0.0527** (0.0239)	-0.3786*** (0.0348)

(续)

解释变量		模型 3 (fe)	模型 4 (fe)	模型 5 (fe)	模型 6 (fe)	模型 7 (fe)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制度与政策 (SP)	system	-0.1473** (0.0725)	-0.1356 (0.1053)	-0.1756* (0.0923)	0.8586*** (0.0833)	-0.1149 (0.0768)
	policy	0.00980 (0.0262)	0.0958*** (0.0356)	-0.0186 (0.0292)	0.0289* (0.0154)	0.2046*** (0.0266)
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EP)	village	0.4218*** (0.0374)	0.4129*** (0.0478)	0.6689*** (0.0414)	0.0097 (0.0208)	0.8210*** (0.0388)
	province	0.1571*** (0.0436)	-0.0604 (0.0629)	0.1306*** (0.0501)	0.0322 (0.0300)	0.1934*** (0.0476)
家庭特征 (FC)	lfamily	-0.0070 (0.0264)	-0.0561 (0.0410)	0.0668** (0.0328)	0.0250 (0.0210)	0.0201 (0.0300)
	efamily	-0.0562 (0.0579)	0.0831 (0.1005)	0.0194 (0.0841)	-0.0209 (0.0517)	0.1413* (0.0764)
	ifamily	-0.1506* (0.0772)	-0.1476 (0.0995)	0.0847 (0.0813)	-0.0239 (0.0433)	0.0919 (0.0773)
	headgender	0.3167*** (0.0761)	0.0090 (0.0930)	-0.0473 (0.0725)	-0.1375** (0.0544)	-0.2541*** (0.0737)
	size	-0.0496*** (0.0101)	0.0328*** (0.0145)	-0.0446*** (0.0117)	0.0438*** (0.0071)	-0.1217*** (0.0105)
	dependency	-0.0561** (0.0237)	-0.5516*** (0.0360)	-0.0291 (0.0271)	-0.1172*** (0.0169)	0.0260 (0.0253)
控制变量 (CV)	region	Yes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Yes
R ²		0.2839	0.4116	0.2264	0.3502	0.0974
F 值		94.47	309.74	32.69	15.63	183.64
hausman 检验 (χ^2 值)		2085.91	2075.49	938.71	4927.58	953.38
样本数 (obs)		110280				

注：同表 3。

就人力资本看，健康、教育、工作经验和培训所体现的人力资本对劳动性收入（包括“家庭经营收入”“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和“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有显著的正向作用，而对“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的影响不显著或显著为负。这表明，一方面，由于目前农户的收入以劳动性收入为主，所以人力资本对于提高农户整体收入水平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转移性支付明显向人力资本较弱的弱势群体倾斜，表明转移性支付提高了农村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对农户收入差距起到了重要的调节作用，提高了社会公平程度，缓和了社会矛盾。

就物质资本看，“耕地面积”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对“家庭经营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但对“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和“财产性收入”的影响显著

为负,对“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没有显著影响。这表明,一方面,土地和生产性固定资产投入代表的农业生产资料,是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和载体,对于农户家庭经营收入有重要作用;但农业生产资料对于农户依附于土地和农业有“牵引”或“拉力”作用,不利于农户外出就业,导致其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降低。另一方面,2003年之后开始实施的系列惠农政策,其核心的政策出发点是支持农业发展,无论是农业税减免,还是种粮、良种、农机购置等补贴,多围绕耕地和农业资本投入展开。因此,拥有耕地或生产性固定资产的依附于农业的农户,成为一系列惠农政策的主要受益者,其获得了更多的转移性支付。

就社会资本看,首先,以“国家干部户”和“党员户”为代表的政治资本,对“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其他收入来源的影响不显著或为负。表明政治资本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主要来自干部工资性收入,该结论与 Morduch 和 Sicular (2000)、Zhang 等 (2012) 的研究十分一致。而“乡村干部户”的情况比较复杂,作为基层干部,乡村干部的工资较低,难以像“国家干部户”一样仅靠工资性收入即可养家糊口,又难以外出务工或经商。该处境和地位使得“乡村干部户”呈现就业兼业化和收入多元化状况,除了“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外,其他收入来源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其次,代表农村弱势群体的“是否军烈属户”和“是否五保户”以及代表特殊群体的“是否少数民族户”和“是否信教户”,其鲜明且一致性的特征是“转移性支付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在转移性支付方面,我国政府对于农村弱势群体和少数民族、宗教户等特殊群体有所倾斜,对于提高其收入水平、维护民族团结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就就业行为看,十分明显的特征是,所选定的3个变量,对“转移性支付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负,而对“财产性收入”的影响均显著为正。这表明,一方面,我国农村的转移性支付倾向于支持农业和务农农户,非农经营或外出务工农户得到的转移性支付收入较低。另一方面,非农经营或外出务工农户收入水平较好,拥有较多的家庭财产,从而有较多的财产性收入。

就制度与政策看,首先,非农户籍对“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的影响显著为正,而对“家庭经营收入”的影响显著为负。由此可见,非农户籍的农户往往是国家干部职工户,其易于远离农业家庭经营,以工资性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因此,户籍制度通过影响农户的就业与职业,影响了农户收入水平。其次,惠农政策对农户收入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转移性支付收入”上。若仅就此结果来看,惠农政策对提高农户收入的作用是“予鱼”层面的短期效应,而不是“予渔”层面的根本治理。同时,惠农政策实施后,“外出打工或经商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表明惠农政策并没有阻止农村劳动力转移的趋势,农民对耕地和农业的依附性并没有显著增强。

就家庭特征看,首先,和核心家庭相比,不完全家庭的“家庭经营收入”显著偏低,该结论良好的体现了“家和万事兴”的寓意。因此,维护农户家庭的完整性,提倡“核心家庭”和“直系家庭”,抑制“不完全家庭”,将利于农户家庭经营收入的提高。其次,对于男性户主家庭,其“家庭经营收入”的系数显著为正,而“国家职工工资性收入”和“转移性支付收入”的系数显著为负。该结论既表明了男性在我国农户家庭经营中依旧处于主导地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对于女性户主的弱势家庭,得到了更多的转移性支付的资助。最后,体现家庭劳动力状况的家庭规模和人口抚养比2个变量,其对各种收入来源的影响均呈现较强的显著性,表明劳动力是影响农户各种收入来源的重要因素,特别是家庭规模较大或人口抚养比较高的农户,其家庭经营收入显著偏低。

最后,金融资产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绝大多数收入来源的影响均显著,表明金融资产

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全面的，其通过各种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水平产生影响。基于此，促进区域经济发展，完善农村金融市场，对农户各种收入来源的提升均有积极作用。

四、结论与评述

“三农”问题是中国实现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稳定发展必须面对的重要问题，历届政府都给予了高度重视。“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的核心是农民增收问题。本文采用 2003~2010 年全国农村固定观察点微观住户数据，研究了我国农户收入水平、结构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发现：

就收入水平看，2003~2010 年，虽然中央政府对“三农”问题高度重视，出台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支农政策，但农户收入水平及增速依旧显著低于城镇居民，表明长期困扰中国经济发展的“城乡鸿沟”“工农差距”“农民增收难”等问题依旧存在。就收入来源与结构看，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劳动性收入，资产性收入的比例较低。其中，家庭经营收入依旧是农户的核心收入来源，表明基于家庭经营的小农经济依旧是中国农村经济的鲜明特征；而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农村劳动力持续外流，外出务工经商收入已经成为农户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则呈现快速增长的良好趋势。

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因素是多元和复杂的，既有产业差异、区域分割、制度与政策等宏观层面的因素，也有农户人力资本积累、物质资本投入、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拥有、就业行为、农户家庭特征等微观视角的因素。而正是由于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以上诸多因素错综复杂，使得“农民增收难”成为“三农”问题的一个症结，很难在短期内顺利解决。同时，就结构性收入看，不同的收入来源，其影响因素有所差异；而不同的影响因素，其对农户收入的影响路径也存在差异。有些因素（例如金融资产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等）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全面性的，它通过各种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水平产生显著影响；但多数变量（例如人力资本、物质资本、金融资产和社会资本、就业行为及制度与政策等）对农户收入的影响是结构性的，其仅仅通过部分收入来源对农户收入水平产生影响。

基于本文的实证结果，要缓解“农民增收难”困局，提升农户收入水平，需要从多方面入手，采取综合性、针对性的政策措施。第一，要考虑农户收入的结构特征，在保持农户家庭经营等传统收入稳定的情况下，重视非农就业对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加快我国城镇化步伐，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无论是农村非农就业，还是外出务工，都有利于提高我国农户的收入水平，实现农民共同富裕；同时要培育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支付等新的农户收入增长点。第二，重视农村人力资本积累，提高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特别是强化农村医疗卫生服务，提高农民健康水平；加强农村基础教育和职业培训，提高农民教育水平和职业技能。第三，重视物质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提高的基础作用，特别是要保护耕地和增加农业资本投入。农民对于耕地依旧具有较强的依赖性，死守“18 亿亩红线”不动摇，不仅有利于中国的粮食安全，也有利于维持农户的收入水平。同时，在坚持集体所有制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等基本制度和政策的前提下，鼓励土地转包、流转和兼并，尝试推行家庭农场模式，有利于增加农业资本投入，克服我国土地细碎化现状，实现农业适度规模化经营，从而增加农业效益和提高农户收入。第四，重视农村金融市场建设，完善农户储蓄和借贷渠道，鼓励农户金融交易，以发挥金融市场对农户的增收作用。同时要重视社会资本对农户收入水平的影响。控制农村“国家干部户”和“乡村干部户”的数量和规模，抑制政治资本的

经济收益；坚持并完善对“军烈属户”“五保户”等农村弱势群体的扶助政策；继续强化西部大开发和少数民族区域扶持发展战略，提高少数民族农村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第五，逐步改善户籍制度及其代表的制度红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消除农民就业的行业障碍和制度歧视；坚持“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政策取向，继续实施和深化系列惠农、支农政策；同时注重经济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和扶贫问题，逐步消除区域经济的巨大差异，都将有利于提高农户收入水平。第六，坚持并适度调整我国农村计划生育政策，既适合控制农户家庭规模，又保证农户家庭劳动力数量，将有利于农户收入水平的提高。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国家固定观察点数据庞大而全面，本文所建立的模型也尽力考虑了变量的系统性和全面性，但计量模型及稳健性检验模型的决定系数仍均低于0.5。这表明，虽然本文建立的模型具有良好的解释性，但仍旧存在未知的影响被解释变量的因素，即仍有一些影响农户收入水平的变量没有纳入模型。由此进一步可见，“农民增收难”是多年积累下来的矛盾，有深刻而复杂的经济、历史、社会、政治等诸方面的原因，比本文的思考要复杂，需要更充分的数据和更复杂的模型才能做出更全面的解释。

参 考 文 献

- [1] Andrew G. Walder, 2002, *Income Determination and Market Opportunity in Rural China* (1978 - 1996)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30 (2): 354~375.
- [2] Autor, David H., Frank Levy, Richard Murnane, 2003, *The Skill Content of Recent Technological Change: An Empirical Exploration*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 1279~1333.
- [3] B. Gustafsson, Shi Li, 2002, *Income Inequality within and Across Counties in Rural China 1988 and 1995* [J],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69: 179~204.
- [4] Blinder Alan, 1973, *Wage Discrimination: Reduced Form and Structural Estimates* [J],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8: 436~455.
- [5] D. T. Yang, 1999, *Urban-biased Policies and Rising Income Inequality in Chin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89 (2): 360~310.
- [6] G. S. Becker, 1966, *Education and the Distribution of Earnings*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6 (1): 358~380.
- [7] Hausman Jerry A., William E. Taylor, 1981, *Panel Data and Unobservable Individual Effects* [J], *Econometrica*, 49 (6): 1377~1398.
- [8] J. Gibson, J. Huang, S. Rozelle, 2001, *Why is Income Inequality so Low in China Compared to Other Countries? The Effect of Household Survey Methods* [J], *Economics Letters*, 71 (3), 29~33.
- [9] Jian Zhang, John Giles, Scott Rozelle, 2012, *Does It Pay to Be a Cadre? Estimating the Returns to Being a Local Official in Rural China*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Economics*, 40 (3): 337~356.
- [10] John Knight, Linda Yueh, 2008, *The Role of Social Capital in the Labor Market in China* [J], *Economics of Transition*, 16 (3), 389~414.
- [11] Jonathan Morduch, Terry Sicular, 2000, *Politics, Growth, and Inequality in Rural China: Does It Pay to Join the Party*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77 (3): 331~356.
- [12] Kuznets S., 1955, *Economic Growth and Income Inequality*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5 (1): 1~28.
- [13] Lin Nan, 2001, *Social Capital* [M],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14] Lucas R. E., 1988, *On the Mechanic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J], *Journal of Monetary Economy*, 22 (1): 3~42.
- [15] Mincer Jacob, 1974, *Schooling, Experience and Earnings* [J], New York: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16] Oaxaca, Ronald L., Michael R. Ransom, 1994, *On Discrimination and the Decomposition of Wage Differential* [J],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61 (1): 5~21.

[17] Park K., 1996, *Educational Expansion and Educational Inequality on Income Distribution* [J], Economics of Education Review, 15 (1): 51~58.

[18] Psacharopoulos G., 1985, *Returns to Education: A Further International Update and Implications* [J], The Journal of Human Resources, 20 (4): 583~604.

[19] Shorrocks Anthony, Wan Guanghua, 2005, *Spatial Decomposition of Inequality* [J], Journal of Economic Geography, 15 (1): 59~81.

[20] Szelenyi I., 1978, *Social Inequality in State Socialist Redistributive Economie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19 (1): 63~87.

[21] T. W. Schultz, 1961, *Investment in Human Capital*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51 (1): 1~17.

[22] 蔡昉:《城乡收入差距与制度变革的临界点》[J],《中国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23] 程名望、史清华、杨剑侠:《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因与障碍的一种解释》[J],《经济研究》2006年第4期。

[24] 高梦滔、姚洋:《农户收入差距的微观基础:物质资本还是人力资本》[J],《经济研究》2006年第12期。

[25] 李实:《中国个人收入分配研究回顾与展望》[J],《经济学(季刊)》2003年第2期。

[26] 李实、罗楚亮:《中国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对修正样本结构偏差的尝试》[J],《经济研究》2011年第4期。

[27] 陆铭、陈钊:《城市化、城市倾向的经济政策与城乡收入差距》[J],《经济研究》2004年第6期。

[28] 罗楚亮:《经济增长、收入差距与农村贫困》[J],《经济研究》2012年第2期。

[29] 万广华:《解释中国农村区域间的收入不平等:一种基于回归方程的分解方法》[J],《经济研究》2004年第8期。

[30] 王弟海:《健康人力资本、经济增长和贫困陷阱》[J],《经济研究》2012年第6期。

[31] 王海港、黄少安、李琴、罗凤金:《职业技能培训对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影响》[J],《经济研究》2009年第9期。

[32] 王睿、黄森:《农村资金投入与农村区域间居民收入差异——基于1999~2006年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0年第1期。

[33] 王亚峰:《中国1985~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分布的估计》[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12年第9期。

[34] 王小鲁、樊纲:《中国收入差距的走势和影响因素分析》[J],《经济研究》2005年第10期。

[35] 徐舒:《技术进步、教育收益与收入不平等》[J],《经济研究》2010年第9期。

[36] 徐月宾、刘凤芹、张秀兰:《中国农村反贫困政策的反思——从社会救助向社会保护转变》[J],《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3期。

[37] 杨新铭、罗润东:《技术进步条件下农村人力资本与收入差距的互动机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08年第1期。

[38] 张泓骏、施晓霞:《教育、经验和农民工的收入》[J],《世界经济文汇》2006年第1期。

[39] 张爽、陆铭、章元:《社会资本的作用随市场化进程减弱还是加强?——来自中国农村贫困的实证研究》[J],《经济学(季刊)》2007年第2期。

[40] 章元、万广华、刘修岩、许庆:《参与市场与农村贫困:一个微观分析的视角》[J],《世界经济》2009年第9期。

[41] 邹薇、张芬:《农村地区收入差异与人力资本积累》[J],《中国社会科学》2006年第2期。